

Abstracts Translations (Chinese)

Mental Health Care System and Mental Health Expenditures in the Czech Republic

Martin Dlouhy

捷克共和国精神卫生保健体系和精神卫生支出

马丁 特罗伊（捷克共和国）

摘要

背景：精神卫生保健是捷克共和国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缺乏精神卫生支出信息和研究。然而，掌握精神卫生支出及其构成方面的信息是认识精神疾病给社会造成损失的基础。

研究目的：介绍捷克共和国精神卫生保健筹资与服务提供体系，估算该国 2001 年精神卫生支出。本文针对捷克共和国卫生服务供给结构、卫生总支出所占比例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行了分析，还对该国和其他国家精神卫生支出进行了比较。

研究方法：该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捷克共和国卫生信息与统计协会和国民健康保险基金会。精神卫生支出是指第一诊断为 ICD-10 中所列的精神和行为疾病（F00-F99）相关的服务支出。不同类型的服务使用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此外，还对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疾病保险支出进行了估算。

研究结果：捷克共和国有 4% 的人被诊断为精神疾病并接受治疗，精神病患者占有所有病人的 2% 左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捷克共和国精神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3.54%）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0.26%）都较低。精神病医院花费了精神卫生总支出的 35.6%，处方药品和辅助治疗占 33.2%，专业门诊服务占 17.4%，其他服务消耗相对较少。

对卫生保健政策的启示：首先，如果将精神卫生支出总额看作是政府对精神卫生服务承诺的一个指标，那么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捷克共和国没有把精神卫生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其次，应提高精神疾病患病资料的可得性，对这些资料进行定期分析研究，取得更有效的结果。

Does Relative Deprivation Predict the Nee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hristine Eibner, Roland Sturm, Carole Roan Gresenz

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意味着需要精神卫生服务吗？

克里斯廷 艾伯纳，罗兰德 斯特姆，
卡尔 罗安 格里森（美国）

摘要

背景：有些研究假设心理疾病与低收入和健康状况较差有关，但是没有人真正研究过社会地位低下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了与对照组相比，低收入是否与抑郁症或焦虑症高发有关。对照组是指一组有着相似人口学特征和地理特征的个人。我们假定对社会地位低下的认知会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

研究目的：我们试图确定对照组内不同个体的收入状况会影响精神健康。此项研究的贡献是：（i）除了地理特征外，还利用人口学特征界定对照组；（ii）分析个人收入状况，而不是不同组之间的不平等；（iii）关注与精神卫生有关的结果。

方法：我们的基础数据来自社区卫生保健项目（HCC）的国民家庭调查。该项目由 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资助，对个人饮酒、药物滥用或者精神疾病风险进行调查，并追踪卫生保健体系变化对上述行为的影响。社区卫生保健项目（HCC）是对社会追踪调查的补充，再次访问了该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为了确定相对社会地位，我们使用了 2000 年人口普查中 5% 的公众服务利用资料。并使用 Yitzhaki 指数作为相对社会地位的测量指标，此指数用于测量某个人对自己和对参照组中较富裕的人之间期望收入的差距。我们运用具有随机效应的条件 logit 模型评价相对社会地位低下与精神卫生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即使控制个人绝对收入状况的影响，那些低收入人群仍然处于患精神疾病的高风险状态。这一发现对抑郁症和焦虑症均适用。

讨论和局限：我们发现社会地位相对低下与抑郁症或焦虑症患者可能性增加有关。模拟数据表明，社会地位相对提高 25%，精神疾病发生的可能性就减少 9.5%。此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仅使用一个指标反映相对社会地位，而且界定参照组所使用的地理区域较大。

* **Correspondence to:** Ningshan Chen, Professor of Health Economics, China National Health Economics Institute, P.O.Box 218, 38 Xueyuanlu,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hina.

对卫生政策的启示：收入较低可能会产生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认知。要消除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影响，除了考虑物质因素，还应当考虑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尊心。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将来的研究，应探索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解释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和机体健康状况较差之间的联系。

Economic Evaluation of Treatments for Children with Severe Behavioural Problems

Rachel Muntz, Judy Hutchings, Rhiannon-Tudor Edwards,
Barry Hounsborne, Alan Ó'Céilleachair

对存在严重行为问题的儿童进行治疗的经济评估

雷切尔 姆兹, 朱迪 哈赤, 瑞安娜 托德 爱德华兹,
巴里 赫恩萨, 爱兰 萨伊沙赫 (英国):

摘要

背景：至少 10%的儿童受到包括行为错乱在内的行为疾病的影响，而且这也是对儿童进行心理卫生治疗的最常见原因。不能治愈的行为疾病对社会经济产生长期影响，按照一个人的一生来计算，可能超过一百万英镑。

研究目的：从多部门提供服务的角度，以试点项目为基础，比较对存在严重行为问题的儿童进行常规治疗和强化治疗的成本效果。

方法：由于儿童存在严重行为问题而到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中心 (CAMHS) 接受服务的 42 个家庭参与了这项为期 6 个月的对照实验。这些家庭被随机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强化治疗组。项目开始时儿童年龄为 2-10 岁，研究活动包括 6 个月的干预和 4 年的跟踪调查。在四年的调查阶段，采用增量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对两种治疗进行了比较。分析中使用了有关强化治疗和常规治疗服务提供方面的数据，主要包括治疗时间和儿童利用健康、特殊教育、社会服务方面的费用。

结果：在 6 个月的实验过程中，所有儿童的行为都得到改善，但是只有参与强化治疗的对象在随后的四年行为持续改善。T 检验结果表明，在随后的四年中，各组均数有明显差别 ($P=0.027$)。成本效果曲线图 CEAC 中的中值线估计值为 -224 英镑。在可控性干预过程中 89.6%的成本效果水平代表比对照组节约成本，而 99.9%代表效果的提高。因此从成本效果角度，不能认为强化治疗明显不同于常规治疗。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认为强化治疗更具成本效果。

讨论：现在针对患有严重行为疾病儿童之父母的培训性干预是由 CAMHS 提供的一套策略，包括对正确行为的巩固和父母所作的记

录。另一种治疗方法是在包括常规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再增加每次五小时的治疗单元。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对父母和孩子的交流进行录像并用于向父母反馈，为行为训练提供机会。目前的研究结论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治疗方法比常规治疗更具有成本效果。

结论：可以认为，在实验的基础上，尽管 CEAC 未能显示强化治疗与常规治疗的成本效果有明显区别，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或在权衡资源/效益的情况下，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被认为更具有成本效果。

对卫生保健服务提供、利用和政策的启示：卫生与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实践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尽管由于样本量小，可以认为本研究仅仅是一个实验，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投资于以父母干预措施为基础的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比仅为父母提供治疗建议的常规治疗方法更节约、效果更好。

对今后研究的启示：未来研究可继续本研究已经做的工作，但应包括更多的研究对象，以发现针对父母的项目中更有效的内容和干预措施、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成本与效果。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Mothers

Joseph J. Sabia

酒精消费与针对母亲的家庭暴力

约瑟夫 J. 莎比亚 (美国)

摘要

背景：最近，谋杀案件的增加和保护胎儿免受暴力法案的通过，政策制定者更加关注针对孕妇和年轻母亲的家庭暴力。男性酒精消费和虐待配偶之间的关联使一些人认为，对饮酒制定更加严格的法规可以减少家庭暴力。

研究目的：(i) 研究男性酒精消费与针对年轻母亲的家庭暴力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这种关联性对未观察到的个体差异的敏感程度；(ii) 研究较高的酒类税赋和更严格的饮酒控制法规是否与家庭暴力事件发生率的降低有关。

方法：根据对易破碎家庭和儿童健康的研究资料，利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双变量最小二乘法、固定效果模型来分析酒精消费与家庭暴力之间的关系。

结果：当男性酒精消费与针对年轻母亲的家庭暴力事件呈正相关时，这种关联对未观察因素的假设非常敏感。可以证明较高的酒类税赋或更严格的限制饮酒法规能够减少家庭暴力的证据很少。

讨论与局限：研究结果为“未观察因素的假设”提供了证据。也

ABSTRACTS TRANSLATIONS (CHINESE)

J Ment Health Policy Econ 7, 207-209 (2004)

就是说，未观察到的父亲特征或许与其虐待孕妇（或年轻母亲）和饮酒过度的可能性有关联。尽管这种结论不能排除男性酒精消费对家庭暴力的影响，但是至少没有证明有重大影响。此外，能够证明增加酒类赋税或者制定严格的限制酒类供应的法规会减少家庭暴力事件的证据也很少。但是，进一步了解各州之间政策的多样性将有助于对该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研究。

对卫生政策的启示：提高酒类税赋等法规对于减少针对孕妇和年轻母亲的家庭暴力没有什么作用。而且，限制酒类可得性或者增加税赋的政策也将对没有暴力倾向的饮酒者造成伤害，这样的政

策个具针对性。与其运用这种个可靠的间接措施（如控制饮酒），还不如加大对伤害孕妇及其胎儿犯罪的处罚力度，这对减少家庭暴力或许是一个更直接的方法。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今后在研究酒精消费对家庭暴力发生可能性影响时，要认真研究本次研究中未观察到的那些因素对酒精消费和家庭暴力的影响。今后还应当充分利用更能反映国内各州之间不同酒精消费政策的数据，来研究控制饮酒对家庭暴力的影响。
